

腐败征候群：

财富、权力和民主

SYNDROMES OF CORRUPTION:
WEALTH, POWER, AND DEMOCRACY

MICHAEL JOHNSTON

[美] 迈克尔·约翰斯顿 著

袁建华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腐败征候群： 财富、权力和民主

SYNDROMES OF CORRUPTION:

WEALTH, POWER, AND DEMOCRACY

MICHAEL JOHNSTON

[美] 迈克尔·约翰斯顿 著

袁建华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腐败征候群:财富、权力和民主/(美)约翰斯顿
(Johnston, M.)著;袁建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 Syndromes of Corruption: Wealth, Power,
and Democracy

ISBN 978-7-208-08172-7

I. 腐… II. ①约…②袁… III. 廉政建设-研究-世界
IV. D5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6012 号

责任编辑 张笑天

封面装帧 王小阳

腐败征候群:财富、权力和民主

[美] 迈克尔·约翰斯顿 著

袁建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 插页 4 字数 273,0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8172-7/D·1444

定价 33.00 元

腐败：人类社会的顽瘤—— 一个外国学者的思考

腐败一直是存在于人类社会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不论是西方早期思想家还是中国古代圣贤，都在几千年前就开始思考怎样从宏观上防止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因只顾自身利益而导致政治制度败坏和社会治理沦丧。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腐败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腐败研究也逐渐从宏观思考转向对具体问题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对腐败的研究方兴未艾，人才辈出。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历史学和法学等领域的成百上千的学者，纷纷加入。他们彼此借鉴，相互渗透，将腐败研究发展成为一个令人瞩目且生机勃勃的学术领域。

由于腐败需要在历史、文化、政治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去理解，多数学者喜欢从微观入手，专攻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时期的腐败问题。也有学者喜欢从宏观入手，从事所谓大腐败研究(*grand corruption*)，建立理论框架，对各国腐败进行分类，进行横向比较，或纵向(同历史上某一时期)比较，研究腐败的成因、传播、成长途径、各种后果和防治手段。受80年代风行的行为主义理论影响，一些学者试图将腐败研究从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利用民测衡量各国法律结构和财产安全、经济自由度和商务规范程度，用以体现各国的腐败程度，一些学者甚至利用民测搞出衡量各国腐败程度的比较腐败印象指数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

但是，近年来西方的腐败研究越来越面临研究困境。一方面腐败的

定义变得越来越窄,另一方面,腐败研究越来越受各国政治和学界的大气候影响。的确,西方在民主政治体制建立和巩固之后,广义上的政治腐败(即依据政府的目的和合法性来衡量判断政体是否腐败)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和学者研究的焦点。过去十几年来,西方社会科学似乎更关注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等问题;主要焦点多集中在如何减少政治和政府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腐败经常被看成是不彻底的经济自由化的原因甚至后果,政府和社会公共治理机制以及政治被看作是次要的,甚至是问题的一部分。

西方学界一度认为,政府改革应强调西方式的民主,认为既然已经有了几个比较成功的西方发达民主国家,那么西方式民主就应该适用于全世界。20世纪90年代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改革浪潮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部分回应。发展中国家被期待达到发达国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才达到的公共管理水平,虽然它们不得不同时面对来自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国内政治转型时期发生的各种社会压力。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政治逐渐走向宽松,各国经济日趋市场化,人口、资金和信息在全球和跨地区之间的流动逐渐加剧,聚集财富和权力的机会逐渐增多,但是腐败机会也越来越多。结果,腐败现象更加普遍且愈发严重。

腐败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实惠一小部分人的行为。腐败不仅侵占(或先占)公众的基本权益,破坏正常秩序,妨碍经济发展,而且奖励钻营、鼓励欺骗,从而破坏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而当国家治理机制由于腐败猖獗而弱化时,伴随而来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暴力抗争,甚至是恐怖主义。所以,由于腐败的蔓延,“民主化”和政治宽松意味着全球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而“自由化市场经济”则成为仅使少数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且数量越来越多的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人们对腐败研究兴趣的增加,对腐败的理解却越来越单线条,对防腐的措施也越来越通则化。人们越来越喜欢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腐败看成是相同的问题。不同社会中的腐败被放到一起进行比较,而且改革和防腐的“药方”也大同小异。这种现象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人们不仅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而且发现如果改革和反腐“药方”应用不当,可能会引

发更加严重的腐败和社会问题。

然而，尽管过去十几年间人们对腐败的兴趣持续高涨，但鲜有系统的研究来分析比较不同社会的腐败现象到底存在什么联系，更没有多少研究将腐败案例的比较放在更为广阔、更加扎实的学理框架内进行。当前多数的研究仍然是遵循两大基本传统，一种是跨地域（cross-sectional）的比较，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去衡量大多数国家腐败程度，另一种是描述个案、对一个社会的腐败现象提供丰富的细节。这两种研究方式都有明显短处，前者虽然可以进行较为广泛的比较、鉴别发展趋势并可了解腐败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但却忽视了每一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千差万别的国情，假定世界各地的腐败大同小异，发生在丹麦、美国、津巴布韦和中国的腐败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后者虽然可以描述腐败的特定社会背景，腐败的过程，提醒我们腐败如何与复杂的当地文化融为一体，但个案研究通常不能导致系统的、可以超越特殊案例和地点的深层比较。所以，跨地域的研究过分强调腐败的共通性，而案例研究又过分强调腐败的特殊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迈克尔·约翰斯顿的著作《腐败征候群：财富、权力和民主》带给了我们“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和兴奋。作者的创见在于，他试图寻找比较腐败的中间层次，不是将两种传统研究方法对立起来，而是试图将它们相连接。在这部新书中，他引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探讨政治经济参与的途径和公共治理机制与腐败的关系，研究财富和权力怎样在不同的场景下获得、分配、使用和交换，借以揭示政治宽松和经济自由化、公共管理机制的强弱和腐败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联系。

约翰斯顿认为，过去用单一标准将不同社会的腐败分成高度腐败和低度腐败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各国的情况都不相同。由于腐败是对诱因和约束的反应，而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机制对腐败所能产生的诱因和约束大不相同。所以，他认为腐败研究中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看一个社会的公共治理机制与腐败的关系。

何谓公共治理机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有效地保障本国公民的私有财产和基本人权，不能进行税收，不能执行契约，不能提供正常合法渠道让人们表达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国家便没有有效的公共治理机制，也很难来维持社会公共秩序，更不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一个

国家的公共治理机制很弱，那便会导致来自私人方面的努力，来行使那些所需的社会功能，而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腐败和暴力。这样的社会并不一定缺少公众对经济和政治的参与，但多数的参与是在政府管理机制以外的。人们会较少有守法的概念，不仅因为法令稀少且边际模糊，而且法律似乎只服务极少数人。在政治上，结党营私，拉帮成派，甚至私家军队都可能用来代替政府的功能，黑社会（黑手党）甚至可以被用来履行合约契约的执行。在公共治理机制弱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不平等的机会使得一部分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可以公开盘剥大多数。相反，在公共治理机制较强且已经制度化的社会里，政府可以有效地行使上面提到的各种社会功能，政府和公民社会也能够有效地相互制约，影响人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参与，人们的利益和选择能够得以表达，并促使政府对此做出反应。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看一个社会中腐败是否存在，或程度高低，或起因如何，而是要看它的公共治理能力是强是弱，对人们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的参与怎样约束和规范。当公共管理机制弱时，国家可能没有能力对公众的政治要求做出反应，不能有效监督和约束官员的行为，公民社会也没有强大到足以维持社会诚信，并通过建立起的行为规范和公共秩序体系来疏导公众的各种要求。相反，国家治理机制也可能太过强大或公众参与过程太过弱小且分散，使得政策过程中应该有的公民参与都非常困难，这不仅会降低政府公信度，更使得公民们无法保证那些位于管理体制内部的强势官员们不会滥用权力，横行霸道。

考虑到这些因素，约翰斯顿把世界上的腐败症状大致归为四种类型，并分别就每一类型辅以三个典型国家加以分析验证，从而揭示腐败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公共治理机制上的深层问题。第一类是权势市场（influence market），这种腐败主要集中在发达的富裕市场民主国家，如美国、日本和德国。在这些国家里，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都很发达，政治竞争和舆论监督的制度强大且合法，腐败症状经常是在日趋完善的公共管理机制内部而非外部寻找空隙。第二类是精英卡特尔（elite cartel）或精英垄断式，这类腐败最容易发生在经历着激烈政治民主化过程的国家，如意大利、韩国和博茨瓦纳。在那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政治体制日趋开放，但公共管理体制相对较弱。拥有不同权力基础的各

类精英们往往拉帮结伙，旨在保护既得利益和维持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这类腐败行为属于防守型，是精英们谋取控制的主要工具。第三类是寡头与帮派(oligarch and clan)或寡头家族式。在俄罗斯、墨西哥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中，政治和经济机会迅速增加，但公共管理制度化还很软弱，因此，既不能对精英们(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寡头)的财富提供制度化的保护，也无法限制他们依靠黑帮式的暴力来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行为。他们各自为政，相互竞争，使得腐败最为猖獗，并大面积弥散开去。第四类是官僚权贵(official moguls)。这类腐败通常发生在那些政治上仍然非民主，经济开放较慢，公民社会弱小，同时公共管理机制也较弱的国家，如中国、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那里的经济致富机会在增多，但政治参与机会相当有限，导致享有政治垄断地位的精英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使用权力。

约翰斯顿对各类腐败的程度、焦点、方式、受益群体、受害群体、关键资源、公共治理机制强弱及形式、可预测程度、腐败阻力和国际影响都做出了相当深入的分析 and 归纳，并借助统计方法，用大量数据来验证不同国家是否属于他所划分的腐败类型。同时，他也反复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只存在其中一种腐败类型，也没有任何一种症状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正好符合某一个国家。可以说，约翰斯顿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在腐败研究领域另辟蹊径，也为我们思考中国的腐败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和更具比较意义的切入点。

相对西方而言，中国对腐败问题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得到迅速发展。不仅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理论性研究成果和实证性反腐经验，也先后涌现出一批本土化学术著作。总的来说，在对腐败成因、特征和后果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已经取得了相当可喜的进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反腐方面的实践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进步，已经迈开了建立新的治理体系的步伐。近十多年来，中央不仅颁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和法规，也发起了多次反腐败运动，惩办了一批大大小小的贪官。民众的法律意识也逐渐提高，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公民社会的雏形已开始显现。在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具体分析上，西方学者在努力寻找一种比较客观的立场。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客观现实缺乏准确的把握，加之或多或少带有先天的政治偏见，他们对中国腐败的

研究和理解总难免有些缺憾。

在本书中，尽管约翰斯顿特别强调，发达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也有自己独特的腐败问题，也不断提醒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公共管理机制、治理政府和政府的价值。然而，当谈到中国时，他得出的某些结论却多少有失精准。例如他说，中国政治不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体制的低透明度是导致腐败的主因，中国政治制度的类型是治理能力低弱的原因等。其实，中国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并不像他理解的那样羸弱，经济开发的程度也远比他理解的要大，治理体制中导致腐败的体制性问题的确存在，但并不能主要归因于政治制度。对于此类分析，相信中国读者能够做出更加客观、更加公允的判断。

但是无论如何，约翰斯顿的这部新著在理论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走出了长期以来困扰西方，也困扰中国学者的一个研究困境，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腐败不仅有其深层次的学理原因，更与治理机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真正做到社会治理机制的“共有”，才能真正遏制腐败的蔓延，而忽视公共治理能力建设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约翰斯顿是我多年的好友。他20世纪70年代初获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科盖特大学任教，是美国学界腐败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他勤奋耕耘，著作等身，曾主持著名的《政治腐败手册》的编辑工作，该书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再版多次，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1995—2002年期间，我曾与约翰斯顿合作研究中国腐败问题，并先后发表过三篇学术文章。他一丝不苟、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勇于突破常规探索新思路的精神，让我十分敬佩，也受益良多。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他的这部著作，我感到十分欣喜。相信国内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定能从这部既有理论贡献又具现实意义的学术著作中受益，也相信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定能极大地推动我国学界对腐败问题的学术研究。

郝雨凡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2008年11月20日于澳门氹仔

前言

“我已看到未来，它与现在非常相似，只不过时间更长些……”

——丹·奎森贝利

批评家、社会评论家以及棒球右手替补投手

以前，很少有决策者或学者十分关注腐败问题。长期以来，不管何种理由——缺乏系统的证据，还是希望避免出现幼稚的、制度性的既得利益，或实在不愿意冒险涉足一个充满各式各样故事和人物的领地，而且似乎毫无理论上的兴趣——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腐败问题才逐渐回升到议事日程上。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这个问题则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热点话题”，吸引了各国政府、国际援助和贷款机构、企业以及众多学科中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至今，我们对腐败、它与发展的关系、还有改革的复杂性已十分了解，并且我们拥有一套过去一代人无法想象的知识、数据和经验。

然而，就完成的研究工作情况而言，我们似乎已达到一种平稳状态。正如我在此书前几章所言，关于腐败的主流看法是不全面的，把贿赂——通常涉及国际援助和贸易，往往与高层有关——一般视为腐败的同义词。大量的实际工作集中在腐败指数单方面的统计分析或案例研究，虽然十分翔实，但未纳入比较框架。这两种传统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而且没有相互补充。腐败所产生的影响常常被简化为经济学数据，虽使统计工作变得便捷，但过于把 GDP 走势与人类福祉相提并论，很少论及

公正性。关于腐败问题的辩论主要由那些鼓吹大规模改革（通常称为全球一体化）的群体所驱动的——我认为那些观点和政策多半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按照阻碍自由市场的情况来界定腐败问题，并且把改革主要视为一项持续经济自由化的任务。最后，尽管人们大肆谈论要理解环境多样性，但改革的建议则大同小异。

此书并不对那些利益集团和观点进行直接的抨击：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们已了解了太多的情况，可以说这些重大辩论和调查结果从任何意义上而言都是完全错误的。确切地说，此书表达一位善意的批评家的种种想法，至少，他不愿腐败研究的未来“与现在别无两样，只不过时间更长些”。虽然我批评了自由化鼓吹者的某些论点、调查结果以及某些政策，同时也批评了美国的某些政府机构，但我是以学者和顾问的身份参与这些辩论的。我始终倾听各方观点。对于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著名的腐败感觉指标（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从方法论而言，我保留意见。在本书中的许多处，我表达了这些观点。但（在此彻底公布于众）十年来我也参加了透明国际有关美国章节的写作，我认同该组织的所有目标，并十分尊重透明国际（及其腐败感觉指标）所做的一切——把腐败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并毫不妥协。

然而，我对腐败以及人们必须要进行的改革提出一个更为不同的、相对的看法。其目的在于首先了解更深层的发展趋势和那些在发展中出现的困难，探究它们在各个社会所经历的各具有特点的系统性腐败问题中的含义。这些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腐败，不仅在那些发生着更大变革的社会里存在，而且在富裕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也存在。诚然，那些比较贫穷、不太民主的国家里出现的某些腐败问题也发生在世界上比较发达地区。我提出存在四组严重腐败征候群，要对每组征候群进行案例研究，并考虑针对每组腐败征候群进行不同的（我希望，有效的）改革治理。这种探讨强调我们应该（或不应该）采用熟悉的改革措施而非寻找特效武器。正如我在最后一章开头所言的，不太可能所有关注腐败问题的人读了这些章节后会完全被说服。恰恰相反，此目的是为了重新激发人们对在不同环境中腐败的表现形式、形成这些差别的根本原因，以及通过采取更加合适的治理方法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进行讨论。

不管本书有何种优点或缺点,没有人们的大力支持和众多建议,我是无法完成这本书的。我的妻子 Betsy,以及我们的儿子 Michael 和 Patrick 忍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关于腐败和改革的冗长讨论。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以及在此之前的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天啊……)三十年来都鼓励我从事此领域的教学和研究。科尔盖特大学研究委员会为研究助理人员提供经费;院长办公室以及社会科学部支持我出差参加各种会议。十分感激科尔盖特大学和其他各处的朋友和同事,包括 Jessica Allina-Pisano, Miriam A. Golden, Yufan Hao, Sahr J. Kpundeh, Sharon Lean, Bert Levine, Stephen Morris, Nikolay Naydenov, Madalene O'Donnell, Anne Pitcher, Susan Rose-Ackerman, 以及 Bertram Spector 阅读了草稿的各个章节并作了评论。墨西哥自治国家大学(Autonomous National University)的 Antonio Azuela 教授以及公共事务部的 Javier González 为有关墨西哥总统选举改革的题目提供了极好的指导。科尔盖特大学俄语系的 Ian Helfant 与其学生 Amanda Egan 为本书数处提供了快速、精湛的翻译,以及透明国际—阿塞拜疆的 Rena Safaraliyeva 在本书获准使用封面画像的过程中充当了极其重要的中间人。科尔盖特大学的 Cindy Terrier 和 Linda Rauscher 始终不渝地提供行政和文秘支持。数年来我的学生研究助手,包括 Richard Kim, Frances Masih, Jerri Pittsley, Tiffany Thompson, 以及 Cecilia Wagner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本书作出贡献。

在 2002—2003 学年中,我荣幸地成为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学会的会员,以及人文学科国家资助的研究员。该研究所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一个真正从事研究腐败和其他问题的学者群体,最重要的是,一年自由自在的研究时光。事实证明所有一切对于完成本书是必不可少的。Michael Walzer 在研究所组织了一场针对腐败问题的令人振奋的专题讨论会。我从他和 Clifford Geertz、Eric Maskin、Philip Bond、Brenda Chalfin、Neil Englehart、John Gerring、Jennifer Hasty、Rasma Karklins、Madeline Kochen、Wolf Lepenies、Sankar Muthu、Roberto Serrano Ralph Thaxton 的评论中受益匪浅。学会秘书 Linda Garat 功不可没。为过去美好的一年,我谨向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所有同仁致谢,

以及对人文学科国家资助表示感谢。同时我也要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伊学院(John Jay College)的 William Heffernan 和 John Kleinig 教授在 2002 年 9 月他们组织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会议上给了我提交腐败分类法初版本的机会。华盛顿的 Anne Lauer 和她的同事近年来在一系列的案例陈述的过程中向我提供了极好的反馈。由 Susan Pharr 教授指导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韦瑟黑德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International Affairs)专题讨论会的成员于 2004 年 10 月在回应本人有关亚洲案例的陈述中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和建议。剑桥大学出版社 John Haslam 以及他的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在许多方面是有价值的。所有这些人帮助本人完成了一本质量颇佳的书。当然,他们毋庸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承担任何责任。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开始讲授有关政治腐败的高级讲座课程。讲座伊始,主要讨论美国的腐败案例,同时增加几个比较案例,随后,讨论内容逐渐扩展到国际腐败和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其中美国也是众多案例之一。此外,在这些年里,我有机会访问了各种国家,研究和参与了它们的改革努力,并且作讲座和参加会议。所到之处,我遇到的学生、学者、公民以及官员积极地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和新观点。那就是我所希望的未来将与现在非常相似的一部分。

纽约,厄尔维勒

2005 年 1 月 5 日

目 录

腐败：人类社会的顽痼——一个外国学者的思考 / I

前言 / VII

第一章 财富、权力与腐败 / 1

第二章 国际环境：权力、共识与政策 / 16

第三章 参与、制度与腐败征候群 / 37

第四章 权势市场：权势寻租，决策出售 / 61

第五章 精英卡特尔：如何收买朋友，如何统治人民 / 93

第六章 寡头与帮派：我们是一家人——而你们则不是 / 126

第七章 官僚权贵：伸手和排挤他人 / 163

第八章 从分析至改革 / 194

附录A：各组国家以及至统计数据中心的距离 / 229

附录B：国家组群的统计指标 / 233

参考文献 / 235

译后记 / 284

第一章

财富、权力与腐败

三个问题

二十多年的政治和市场的自由化以及跨越地区和全球的人员、资本和信息日趋快速流动，重塑了世界各地的社会——诸多方面得到改善。但是，这些发展也伴随着人们对腐败产生了新的担忧。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新机会很多，但非法利用并交换财富与权力的新花样也层出不穷，而且把非法所得迅速转移境外。腐败使少数人获益而使大多数人受损；腐败使经济发展缓慢或使经济畸形发展，取代基本权利和合法程序，盗用基础服务、国际援助以及整个经济的资源。特别在那些国家制度薄弱的地方，腐败常常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部分是由于腐败，对于许多人来说，“民主”意味着越来越不安全，在“自由市场”地方，富人似乎越来越富有，然而其他人却受到损害。

这些问题引发对人们追求并交换财富与权力方式，以及对社会与经济管理方式产生根本怀疑。就一代人而言，现在我们已通过市场经济解决公正、责任及改革等重大问题，或试图把政治和政府管理纳入类似市场化的程序中。对于保持民主和市场经济、制约其过度发展而言曾经至关重要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架构，业已受到轻视或被认为是要通过进一步自由化加以解决的问题。同时，人们期待发展中社会能达到发达社会花

了几十年才达到的透明度和道德水准，并且希望发展中社会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和进行政治转型的同时达到这种水准。一种千篇一律地把腐败主要视为受贿、区别仅在于各个社会中所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并把改革视为促使发展中社会更西方化的过程的观点使问题复杂化了。

富裕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在诸多方面都相差无几，但是贫穷和专制国家在诸多方面不尽相同——腐败现象也是如此。要回应这些不同的问题，在分析上以及政治上都构成一种挑战：倘若全球政治及经济的变化所带来的利益能得到更为公平的分享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了解各个不同社会中的特殊腐败问题，强调政府的价值、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实质性的“深度民主化”。

可对照的腐败征候群

这是一本关于腐败和发展的书，重点研究财富与权力在不同的环境中是如何被利用和作交换的。我将解答三个问题：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优势和弱点，各个社会所经历的各种腐败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影响力的不同组合产生了哪些腐败征候群，以及它们有何区别？什么样的改革适合于或不适合于解决各种突出的腐败问题？

像绝大多数分析家们一样，我坚持认为腐败是非民主的并对经济增长造成极大危害。但是，本书在四个重要方面与其他大部分书有所不同。第一，我认为仅仅按照一种单一的从高至低腐败程度的标准来划分社会，其意义不大。相反，我认同四组可对照的腐败征候群，它们反映了长期存在的民主和经济参与以及制度的深层次问题。第二，我的分析包含了发达社会以及发展中社会中的腐败问题。富庶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有着自身的腐败问题——同时他们提出各种改革的观念——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发展中社会所面临的困难和机会。

第三，我不赞成目前众多改革方案，因为我认为仅仅认同一种发展中社会似乎所缺少的理想市场民主模式还不够。相反，我们必须检查那些实际上正在起作用的，并导致那些社会所经历的种种腐败的驱动力和利益诉求。这样做将会产生各种社会之间不同的改革策略，但也要得到社

会长期利益的支持。最后,此书的主要命题是关于各种制度、政治及国家的重要性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腐败常常被认为与不完善的经济自由化有着因果关系;公共机构以及政治则被视为阻碍其进程的主要羁绊。公共部门的改革则强调狭隘的“善治”目标,而在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推进过程中缺乏扎实的制度基础。相比之下,我认为改革不仅是一个改善公共管理的问题,而且是一件有关正义的大事。它要求“深度民主化”:不仅要求选举,而且要求对人们以及集团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积极的争论。这些人们和集团有能力为自己进行政治辩护,在其长期自身利益的支撑下,他们有能力取得政治解决。这种争论以及它所培植的各种机构的社会“所有权”,有助于在各种社会中建立民主,现在民主在这些社会里已强大了(Rustow, 1970)。没有这种社会基础,即使再好的改革理念也无法扎根。

我将在八章里探讨这些论点。第一章揭示腐败征候群的本质。第二章探究在经济自由化的推动下人们在腐败问题上出现的“新共识”,以及它与民主化和发展之间的联系。在第三章中我提出四组征候群,它们反映了人们普遍发现的政治和经济参与和制度的内在联系。权势市场(Influence Market)腐败涉及为了私人利益往往通过政治人物充当中间人,竭力在那些制度化完善的决策程序内收买接近权和影响力。这是一种最具有先进市场民主国家特征的腐败,然而,尽管它已形成改革的基本概念,但它在重要方面却表现出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精英卡特尔(Elite Cartel)腐败发生在政治、经济、军事、官僚,或族群和社会精英网络中并帮助支撑这些网络,它依赖于有问题的社会。这种腐败帮助这些精英们在日趋激烈的政治竞争环境中及仅在稍强的机构中维护其霸权。寡头与帮派(Oligarch and Clan)腐败发生在一种危险的、有时暴力的、经济和政治机遇迅速扩增且制度弱化的环境中。这些卡特尔都由一些人(可能是政府官员或企业家)所掌控,他们的权力是个人权力并吸引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官僚权贵(Official Moguls)腐败涉及政府官员及其受保护人。他们破坏经济、中饱私囊而逍遥法外。在这类腐败中制度和政治竞争是最弱的,经济发展机遇常常不多,竞争激烈。第三章的统计分析采用参与和制度的衡量标准把100多个国家归类于四组腐败征候群。